

民主人士周硕臣先生

顾梦红

周硕臣的祖籍在山西洪洞县，清末民初，政局动乱，为避战祸和饥馑，周家逃荒到房山县惠南庄。

周硕臣出生于 1900 年，时值西方列强宰割中国，中华民族备受欺凌的时代，悲剧深深印刻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满怀报国之志的周硕臣开始在乡间任教。那时私塾学馆都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而热血青年周硕臣则公开讲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来激励青年学生，教育他们矢志报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傀儡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两年后日本帝国主义越过长城一线，加速了吞并中国的进程，平津受到威胁。1935 年“一二·九运动”后，青年学生积极组织南下宣讲团，抗日救国的呼声震撼九州。强烈的爱国热情鼓舞着年青的周硕臣，他以“位卑未敢忘忧国”为坚定的人生信条，在教学之余，他悉心研读中国历史的兴衰史，学习孙中山先生的文集，寻找救国救民之路。西安事变前，周硕臣对蒋介石积极反共，对日寇的侵略不抵抗政策极其愤慨，他奋笔疾书写信给国民政府，要求积极抗日，共御外辱，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然而这封信被蒋介石冷置起来，周硕臣对蒋介石的最后一点幻想终于破灭了，从此，他便把希望寄托到共产党身上。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铁蹄践踏房山大地，黎民百姓惨遭蹂躏，周硕臣被乡亲们推举为村长，组织村民抗日自卫。不久，他在共产党员李振东的帮助下，秘密到涞水县“野三坡”找到了共产党。他从山里带回《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一系列宣传品，在房山西南一带进行抗日宣传，为八路军筹粮筹款，带领村民走上了抗日道路。

1938 年，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之后，邓华、宋时伦支队来到平西开展抗日活动。周硕臣以其在村民中的威望和能力积极组织征兵、筹粮等工作，并在自己家中秘密设立了中共的地下交通站。为了以实际行动号召群众踊跃参加抗日斗争，周硕臣毅然把三个儿子都送进了抗日队伍。长子周景岩到北平万寿山作地下交通员，次子周南及霍洪江等人送到房涞涿联合县政府所在地“野三坡”抗日中学。后来，在长子周景岩的一再要求下，他又把这个生活上的唯一帮手也送到县里参加秘密工作，接着又动员内弟参加了革命，并把年仅十三岁的幼子周景橙送到了十渡的抗日根据地。

1940 年，平西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起来，张坊十渡一带除了有七团、九团、县大队等大股力量外，每村都有游击小组，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十分活跃。那时周硕臣经常跟着县委副书记赵然活动，战斗情谊使他们成为忘年之

交。

1940年6月，赵然当选为房良联合县政府的县议会议长，周硕臣当选为副议长，他们的合作就更密切了。一次，日寇风风火火地来到穆家口抢粮食，当时我主力部队正巧不在十渡地区，情况异常紧急。赵然知道情况后，立即组织村里的干部民兵带领群众转移粮食。突然，敌人的枪声大作，枪一响，村里乱了。看着纷乱的群众和来不及运走的粮食，赵然心情十分焦急。这时，周硕臣果断对赵然说：“这几袋粮食运不走就烧了它。咱们不能叫敌人追着屁股打，应该设计引开敌人主力。你布置民兵边打边撤。我带领运粮的人离开大队，到小路上去单独隐蔽起来，然后设法引诱敌人去追县大队。”赵然心里顿时一亮，立刻布置了后卫。周硕臣领着运粮的人进入了一条不起眼的小山沟，把粮食暂藏进了一个石洞。赵然带领大队，故意边打边撤，把敌人引走。事后，赵然感慨地说：“我亏了有你这么个参谋长！”

1941年，日本侵略军对根据地进行多次扫荡之后又发动了“强化治安”运动。平西抗日根据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药品、粮食等物资十分缺乏，周硕臣利用各种关系，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搞到了食盐、无线电器材、药品等大批急需物资，秘密运往根据地，支援前线抗日斗争。深秋时节，周硕臣见县大队的一百多个战士还穿着单衣，夜里宿营时战士们冻得让人心疼。他知道根据地太困难，难以解决冬装，就主动向赵然请示，由自家承担起给县大队战士做军服的任务。他自己掏钱买棉花布匹，找乡亲邻居连夜赶做，使战士们尽快地穿上了棉衣。

为了扩大平西情报网，晋察冀边区决定在长沟设立一个秘密情报站。周硕臣积极筹办，在长沟开了一个“振兴文具店”，对外卖些书籍、纸张、笔砚等。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报纸，秘密接待同志，传递军事情报，秘密接送过往的抗日干部。不久，上级又决定在周家设立了一个秘密交通站，在封锁沟外接应进出山的过往同志。为了便于工作，周硕臣在村里办了个小卖部，来掩护工作，传送消息。他多次义正辞严地对家人说：“这是咱家份内的事，咱们宁可掉脑袋，也要掩护好同志，要是谁把消息漏出去，他就不是咱周家的人！”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这个交通站先后接送过数十个同志，其中多数是向往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党和八路军的重要领导干部。

这年冬天，赵然指示周硕臣的长子到北平西交民巷去接北平地下党支部书记张培华。赵然说，张培华同志是边区政府姚依林秘书长的爱人，那里的情况复杂，一定要保护她的安全。在周家的掩护下，张培华顺利地越过封锁线到达根据地。全国解放后，姚依林夫妇对周家父子的感情依然很深，两家还经常来往。

1942年4月，在去根据地的途中，周硕臣不慎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威逼利诱，老虎凳的砖增加到三块，但始终没有动摇得了周硕臣的革命意志。他在狱中写诗明志：“忧国忧民志未酬，身陷囹圄更何求；青山处处埋忠骨，拼将吾血灌神州！”

周硕臣出狱后，赵然说：“是组织上让你家属卖了家产来营救你们的，你们一家人都参加了革命，今后有什么困难组织上一定给你们解决。”周硕臣激动地说：“我周硕臣早就把一家人交给革命了。现在回来了，更要感激党！要说要求，我只求党给我更多的工作，如果我死了，党要把我的孩子们拉扯大，让他们继续跟党干革命！”

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在阜平温塘召开边区参议会大会，周硕臣光荣地当选了边区参议员。会议期间，他见到了聂荣臻、萧克、程子华等同志，认识了新当选的边区参议长成仿吾。他还看到了根据地广大军民崭新的精神风貌，领会了新的精神，心情异常兴奋，激发了他更大的革命热情。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国民党也很快抢占了平津。原来投靠日军的石窝乡大乡长崔士镰知道周硕臣在当地的威望很高，企图拉拢周硕臣为他们办事，派人传信说要周到房山当县长。周硕臣义正词严地对传信的人说：“你回去对崔士镰说，我周硕臣跟他势不两立，他欠的血债必须偿还！让他死了那份心吧！”

1946年，周硕臣以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常驻代表的身份到了张家口，参加边区联合政府的筹备工作。当时边区参议会有三个驻会参议，一个是参议长成仿吾，当时是华北联大的校长；一个是董岳，解放后曾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周硕臣是唯一的一位党外民主人士，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晋察冀边区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周硕臣从1949年到1953年连续当选为房山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1956年到1958年担任房山县副县长。他勤于政务，作风稳健，举止儒雅，平易近人；他从不抽烟也不嗜酒，生活非常俭朴，总是布料中式装，青布绑腿，一身农民打扮，异常朴素。他对子女要求也极严，教育子女不要攀比吃穿，多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有一次他的幼子从北京骑自行车到房山给他送棉衣，到了县机关时，已经过了晚饭时间，他就到厨房给找了点剩饭。厨师心疼年轻人，要做点新的，他硬是不肯。他在县里工作时，石窝中学是他抓的试点，是他一手筹建起来的，在当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为家乡的孩子能就近上学倾注了许多心血。

1959年，他感到年纪大了，提出辞职申请，被彭真同志安排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馆作馆员。晚年周硕臣研习书法，他写得最好的一条横幅是：马列主义如日月，主席功德似地天。反映了他与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情怀境界。1966年7月12日，他走完了一生中最后一段旅程。1986年5月，中共房山县委，房山县人民政府为悼念周硕臣逝世20周年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当年在平西抗日根据地战斗过的老同志，北京市、房山县的有关党政领导参加了大会，会后举行了周硕臣墓碑揭幕仪式。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房良联合县县委书记的杨济之等老领导在大会上讲话，以“著名的民主人士，共产党的挚友，房山人民的光荣”的赞誉高度评价周硕臣先生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顾梦红：区教师进修学校教师